

清真寺与伊斯兰文明的构建、传播和发展^{*}

马丽蓉

内容提要 清真寺之所以能够成为伊斯兰文明的符号象征，既表现为经训等文化原典中大量经文的系统阐释，又凸显出清真寺在创造伊斯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具体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建构作用；伊斯兰传播的历史既是清真寺的建设历史，也是穆斯林的移民历史，清真寺在伊斯兰文明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文化符号与传播媒介的双重角色，并在穆斯林由游牧——定居——寺市并存——伊斯兰城市——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文化圈——全球穆斯林教缘共同体的形成中功不可没；对于清真寺在伊斯兰文明发展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一问题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充分发掘宗教礼拜场所先在的精神资源优势进行对话，以形成教际对话的长效机制；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和爱资哈尔的伊玛目已在不同层面承担起全球化时代宗教领袖的责任，他们的对话精神值得倡导；拥有清真寺这一话语平台的阐释者应秉承伊斯兰“创制”传统对经训做出合乎时代精神的诠释，以维护伊斯兰文明的阐释权威性。

关键词 伊斯兰文明 清真寺 阿拉伯-伊斯兰问题 文明对话

作者简介 马丽蓉，在读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副所长、《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上海 200083）。

三大圣寺与伊斯兰文明体系的构建

“伊斯兰这个术语，可以照三个意义来使用：起初是一种宗教的名称，随后变成一个国家的名称，最后变成一种文化的名称……作为一种文化来解释的伊斯兰，是军事征服以后，在叙利亚-阿拉马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核心和遗产所组成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逐步形成以伊斯兰教为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文明体系。其中，清真寺在创造伊斯兰物质、精神、制度乃至心理等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礼拜场、讲经台及宣礼塔等形成的清真寺，既能将伊斯兰核心思想最大程度地渗透在这一物质空间中，又能把外部影响转译为穆斯林生存空间的内在逻辑，折射出穆斯林“围寺而居”的生命态势与“因寺而安”的群体心理，形成“家寺同构”的文化本色，凸显出伊斯兰物质文化与心理文化品质；清真寺是穆斯林举行宗教仪式、宣达经训思想，甚至分担诸多社会职责的文化场域。“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学中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旨在强调“随着文化场域逐步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中解脱出来，获得自主性的发展，它们获得了符

^{*}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中东国家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上海市重点学科阿拉伯学项目及“211工程”三期成果。
[美国]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0页。

号权力，亦即把现存的社会安排加以合法化的能力。”清真寺这一文化场域也在自主发展中获得了一定的符号权力，《古兰经》和圣训对此作了如下阐释：（1）“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真主最喜欢的地方是清真寺。”在这里“祈祷真主”才能达到近主和敬主的目的；（2）“从第一天起就以敬畏为地基的清真寺，确是更值得你在里面做礼拜的。”（3）“只有笃信真主和末日，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并畏惧真主者，才配管理（建设）真主的清真寺。”（4）“谁修建一座清真寺，真主在乐园里给他修建一座房子。”（5）希望礼拜者是“爱好清洁者”，因为“真主是喜爱清洁者的”；（6）鼓励穆斯林去清真寺礼拜：“一个人在清真寺里同众人一起礼的拜，要比自己在家礼的拜强二十七倍。”但也“不要过分要求所有的人做礼拜”。（7）警告那些阻止他人入寺礼拜且图谋拆毁清真寺的人。^⑩经训系统阐释清真寺文化成为穆斯林执著追随清真寺的精神动力、积极倡导穆斯林参加集体礼拜又使伊斯兰“六大信仰”思想得以弘扬，由此构成伊斯兰精神文化的基本征貌；“认主独一”是伊斯兰信仰的最高原则与核心价值体系，“这种体系使共享的人在社会组织上、背景上虽然不同，但由于有一种明确的契约，在某些方面能够达成一致^⑪进而形成旨在培育信仰、信念和伦理的人际关系组织与制度，穆斯林在清真寺完成念、礼、斋、课、朝，也就实现了“共意性运动”，并形成相应规章制度，清真寺也成为伊斯兰制度文化的重要实践平台。三大圣寺在伊斯兰文明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主要体现为：

（一）在清真寺里号召并实践“穆斯林皆兄弟”的思想，使公正、仁慈的兄弟情谊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基石

自610年起穆圣就强调“凡穆斯林皆为兄弟”，号召每两人在安拉面前结为兄弟。在穆圣的身体力行下，麦地那穆斯林间的兄弟情谊如同同宗、同胞的手足之情，清真寺像磁场一般将穆斯林情感紧密相连。622年9月，穆圣在入麦地那城之前，曾在城郊逗留参与修建了第一座清真寺——库巴寺，迁入麦地那的“这一天正是主麻日，穆罕默德就在麦地那拉努那河谷的清真寺做了礼拜。穆斯林赶来了，每个人都想见他，都想靠近他^⑫。在他初到麦地那时，在礼拜的各个时辰，穆斯林自发聚到他的住处礼拜，随着穆斯林人数的不断增加，增建清真寺成为必然，麦地那先知寺应运而生，庄严肃穆的宣礼词每日5次传遍四面八方，伊斯兰教的粘结力也随之萌生，抵达麦地那的迁士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首批穆斯林移民，并以“围寺而居”的方式在异地立足，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可以说，“伊斯兰文明的基础与其他文明的基础有所不同。伊斯兰把公正放在比兄弟情谊次要的地位。它认为兄弟情谊包括了公正的含意。”“善良和仁慈是伊斯兰文明的基石——兄弟情谊的支柱”，“是穆罕默德和一切与其他有联系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了安拉的兄弟情谊。^⑬清真寺则最大程度地满足了穆斯林依主旨意“礼拜、施济”的信仰诉求，成了宣传伊斯兰“公正、仁慈”理念的阵地和实践穆斯林平等相待、生死与共兄弟情谊的重要载体。

（二）先知寺等以其拥有宗教和社会的诸多功能，在先知穆罕默德创建乌玛社会的实践中发挥了

[美国]戴维·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47页。

《穆斯林圣训实录》（阿拉伯语），沙特和平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段。

参见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2页。

同上书，第150页。

同上书，第141页。

《布哈里圣训实录》（阿拉伯语），沙特和平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段。

同上书，第151段。

同上书，第649段。

[埃及]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著；王永方、赵桂云译：《穆罕默德生平》，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489页。

⑩ 参见同上书，第12页。

⑪ 《简明华夏百科全书》第6卷，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⑫ [埃及]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著；王永方、赵桂云译：前引书，第186页。

⑬ 同上书，第202页。

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麦地那宪章》规定：“汝辈无论何事发生歧疑争端，均须听从尊严的真主和穆罕默德判断裁决。”史料也记载，穆圣不仅在清真寺里教授《古兰经》及相关教律，还在寺里化解纠纷、审判案件、颁布法令，甚至指挥军事，折射出先知寺等集宗教和社会诸多功能于一体的特性，大体表现为：（1）清真寺是议政、事政的中心，如在先知寺就为四大哈里发先后举行过就任仪式；（2）一般民事纠纷、案件处理多在清真寺进行，穆圣曾在先知寺处理过许多民事诉讼等；（3）清真寺也是重要外交舞台，尤其在被誉为“代表团年”的631年，阿拉伯半岛塞基夫等各部落派遣使团前往麦地那宣布皈依伊斯兰或缔结和约，先知寺承担了重要接待任务；（4）缴纳“天课”多由清真寺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先知常把征收的天课等财物集中在寺里，再据实分配给穆斯林社会的贫弱者；（5）清真寺还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先知寺有一块叫“松法”（意为“凉棚”）的地方，专供无家可归的圣门弟子居住，其中就有传述圣训最多的艾布·胡赖拉等人；（6）在先知时代，特别是在战争之际，清真寺也起过治疗病人、护理伤员等作用，先知就曾在寺里为受伤穆斯林搭设帐篷，以便随时照顾和探视；（7）清真寺都有宽敞院子，可在此进行合法的体育娱乐活动；（8）先知生前的战役几乎都是在先知寺里动员、策划的，因而也具有军事功能……随着清真寺宗教与社会功能的不断增强，穆圣以寺为依托进行了政治、经济、宗教等一系列改革，建立了以“乌玛”（意为“民族”、“国家”）为形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完成了伊斯兰教义体系及各项制度的创建。先知寺还成为伊斯兰民主协商的终审机构，伊斯兰舒拉（民主磋商）制最终成型于清真寺。因此，“伊斯兰诞生于无国家的环境，它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将信徒组织到社团中来进行礼拜，它还必须保护他们。乌玛必须同时既是汇聚的人群，又是国家；而这个胚胎国家便是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的国家”。而在创建“乌玛”社会的过程中，穆圣不仅出色地完成了缔造与传播伊斯兰教的宏伟大业，且成了集“先知、政治家、战士和开拓者”于一身的文明拓荒者。

（三）确立克尔白禁寺为伊斯兰的“中心圣殿”，并借朝觐仪式向全世界穆斯林弘扬“安拉至上”的信仰核心

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半岛民众主要信仰原始宗教，麦加的克尔白神殿内供奉着360多尊各氏族部落神的偶像。630年，穆圣率军进入麦加后，下令捣毁克尔白殿内除黑陨石外的全部偶像，宣布克尔白四周为禁地，改克尔白圣殿为清真寺，实施非穆斯林不得入寺、多神教徒不可朝觐等一系列伊斯兰化举措，使麦加禁寺成为世界穆斯林礼拜的朝向和朝觐的圣地，也因此成为世界穆斯林的“中心圣殿”。《古兰经》也特别强调：（1）规定“当以易卜拉欣的立足地为礼拜处”的原因在于，“我以天房为众人的归宿地和安宁地”；（2）这座“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故“真主以克尔白——禁寺为众人的纲维”；（3）“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并规定具体的朝觐程序；（4）真主在为易卜拉欣父子指定地址并命令建造天房时就禁止“以物配主者”“临近禁寺”。因此，穆圣强调：“先知寺里的一番拜功强于其他寺里的一千倍；而麦加禁寺里的一番拜功强于其他寺里的十万倍。”^⑩事实上，正是

译自伊本·希沙姆著：《先知传》第2卷，第147～153页，埃及穆斯塔法·巴尼·哈勒比出版社，1936年版。

参见[美国]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33页。

[英国]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参见马坚译：前引书，第141页。

同上书，第13页。

同上书，第45页。

同上书，第90页。

同上书，第45页。

参见同上书，第141页。

⑩ 《奈萨仪圣训集》（阿拉伯语），沙特和平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段。

由于禁寺具有至高无上的宗教象征意义而成为世界穆斯林祈祷的方向、朝觐的圣地：“千余年来，朝觐圣地的制度，对于团结全世界的穆斯林，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于联系各种不同的教派，发生了最有效的纽带作用。”“安拉至上”的信仰核心就是从伊斯兰“中心圣殿”由年均数百万朝觐者带向世界各地，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四）耶路撒冷远寺在多灾多难中使“伊斯兰因素”成为影响中东和谈乃至国际关系的重要因子，伊斯兰也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文明”

据说穆圣在天使引领下于 621 年 7 月 27 日夜乘仙马由麦加禁寺夜行至耶路撒冷远寺，将“布拉格”天马拴于“哭墙”处，踩陨石登天，接受真主启示后返回人间，这一日也被穆斯林立为“登霄节”，予以纪念，《古兰经》也有专门记载。622 年穆圣进入麦地那后，与犹太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将礼拜正向定为耶路撒冷远寺。但 17 个月后，鉴于犹太人的背信弃义，安拉默示将穆斯林礼拜正向转为麦加禁寺。广义而言，远寺系指阿克萨清真寺、金顶清真寺及其周围广场、建筑物以至院墙的总称，耶路撒冷烙有伊斯兰文化永恒印记的就是金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傲然矗立，将穆斯林纪念先知“登霄”壮举的敬畏情怀表露无遗。但耶路撒冷也因三大宗教圣地的并存而纷争不断，在“相继经历了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托管等朝代变迁”后，争圣地——占土地——定国都的激烈争夺又使耶路撒冷归属问题直接影响到中东和谈进程，阿克萨清真寺常常成为阿以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其中尤以 1969 年以色列烧毁阿克萨清真寺的极端行动和 2000 年沙龙强行“访问”阿克萨清真寺最为激烈，对地区政治生态造成深远影响：前者导致两大结果：一是 1969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阿以矛盾演变为“伊斯兰共同事业”，并形成伊斯兰世界联手抵制美以两国强权政治的重要机制；二是伊斯兰复兴主义逐步取代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重新显示出其不同寻常的政治感召力。后者则使阿以冲突不断升级，并使哈马斯等激进伊斯兰力量成为影响中东和谈进程的重要因素，引起中东各大政治集团的极大关注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迅速崛起，导致地区形势日趋复杂。可以预见，由于特殊地缘政治和丰富能源资源等因素的渗入，阿以之间围绕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耶路撒冷老城的争夺必将对地区和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由穆圣及其后继者所创建的一系列清真寺，之所以能够成为伊斯兰文明的符号象征，既表现为经训等文化原典中大量经文的系统阐释，又凸显出清真寺在创造伊斯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具体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三大圣寺的相继出现，表明伊斯兰文明基本完成了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化的历史使命，并呈现向外传播的开放态势。

其他名寺与伊斯兰文明的传播

文化学相关理论指出，文化传播多指文化从创造点散布到接受点的过程，一种文化在时间纵向传递和空间横向扩散的传递扩散式迁移继传现象，其实质是文化价值传播，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延伸，它赋予文化价值创造普遍的人类化形态，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日益频繁，其社会作用也更加突出，且传播方式和途径亦多种多样，但以和平与非和平方式为主。当我们从清真寺视角来考察伊斯兰文明发展史后发现，尽管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与阿拉伯穆斯林的军事征服和政治扩张相伴，但军事征服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统治，并没有强迫被征服者改宗伊斯兰教，这是伊斯兰文明传播所

[美国] 希提著；马坚译：前引书，第 159 页。

参见同上书，第 212 页。

参见同上书，第 16 页。

马晓霖：《永远的耶路撒冷》，载《中国穆斯林》，2004 年第 4 期，第 37 页。

参见刘靖华：《伊斯兰传统价值的复兴与超越》，载《西亚非洲》，1989 年第 4 期，第 55~61 页。

参见杨阳、冯帅鹏：《阿克萨清真寺宗教和政治功能解读》，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56 页。

依循的最基本原则，并形成特有的传播途径：阿巴斯王朝建立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伊斯兰文化日趋繁荣。阿巴斯王朝灭亡前后，伊斯兰世界已四分五裂，但伊斯兰教却传播到一些穆斯林武力未及地区，伊斯兰传播已不能凭借军事征服和政治扩张，主要是穆斯林商人、神秘主义苦行者和学者的自发努力：穆斯林商人沿贸易路线进入非伊斯兰地区，通过商业社团影响当地统治者，使之逐渐皈依伊斯兰教；苏非派苦行者深入民众对社会下层产生巨大影响；宗教学者在此基础上再施加影响，推动社会伊斯兰化，当地伊斯兰统治者或穆斯林圣徒，号召清除异教，净化信仰，或发动圣战，扩大伊斯兰教领土，最终根据教法重建穆斯林社会。大致通过这几种方式，东南亚、热带非洲等地也变为伊斯兰世界的外围地区。“从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历史来看，主动、开放与自守是文明交往的主要特征和文明兴衰的主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与其他文化相融而致的清真寺亚文化，既是伊斯兰文明“主动、开放与自守”的突出显现，也是伊斯兰文明向世界传播的物质产物，并在不同传播阶段出现了相应数量的著名清真寺，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中国和美欧等地世界著名清真寺的相继建立与伊斯兰教的世界传播几乎同步（详见本刊第78页《伊斯兰文明“依寺传播”简表》的内容），其传播规律为：在阿拉伯王朝更迭的历史变迁中，伊斯兰文明也随之变迁，或强或弱地吸纳了异质文明的养分，出现了阿拔斯王朝时期集中建设、扩建甚至改建清真寺的繁荣现象，伊斯兰文明借助清真寺这一文化场得以广泛传播，清真寺成了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媒介，穆斯林移民也随清真寺的不断出现而成正比发展，形成有清真寺就会有穆斯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也会越明显这一基本规律。清真寺不仅标示着伊斯兰文明的传播范围与程度，还标示着穆斯林移民的潮起与潮落。可以说，伊斯兰的确立与传播的历史既是清真寺的建设历史，也是穆斯林的移民历史，清真寺在伊斯兰文明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文化符号与传播媒介的双重角色。

从穆圣参建的库巴寺一直到世界各地正在或即将竣工的清真寺，都是伊斯兰文明“依寺传播”与穆斯林“围寺而居”的真实写照，并以三大圣寺和著名清真寺为基点形成空间毗邻性和地缘一体性，“一种直观或显性的空间格局，一种基于这种空间格局的经济互动性和文化亲缘性。它也意味着一种隐性或潜在的政治整合的功能。”基于清真寺这一特定文化场域所形成的先在的文化认同感与隐性的社会动员力尤为鲜明，清真寺在穆斯林由游牧——定居——寺市并存——伊斯兰城市——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文化圈——全球穆斯林教缘共同体的形成等方面功不可没，凸显出伊斯兰文明是一种生命形态的文明，更是一种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文明这一本质，亦即它“不仅建立在特定的生命形态（价值观、风俗习惯、文学、文字、艺术、建筑样式，等等）之基础上，更建立在至关重要的地缘要素之基础上。”

清真寺与伊斯兰文明的发展

“伊斯兰文明体系的发展，始终得从本身的历史、宗教信仰和民族属性出发，在依据自身的发展利益需要选取或重新解读《古兰经》、圣训的有关经文的基础上，制订出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指导原则，并通过对古今文化、内外文化的兼收并蓄和继承创新才能实现。实际上都关系到在全球化形势下，伊斯兰文明体系的核心价值构建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确定，意义十分重大。”当今世界对伊斯兰文明日益关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甚至将“政治伊斯兰”列为决定世界大势的三大因素之一。

参见周燮藩：《伊斯兰教传播的地区是怎样伊斯兰化的？》，载金宜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蔡德麟、景海峰主编：《文明对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同上书，第101页。

朱威烈：《伊斯兰文明与世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34页。

在国际体系转型和重建之际，伊斯兰文明体系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又怎样对待伊斯兰文明等都会影响伊斯兰文明发展趋势。因此，对于清真寺在伊斯兰文明发展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一问题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一) 从“寺堂改建”到“寺堂共用”，表明人们对宗教场所的认知已发生质的飞跃，清真寺或教堂因具有特定场域资源优势而有可能形成教际对话机制

建于709年的阿克萨清真寺是建在原圣殿教堂残存的基墙上，教堂完好部分也被建在寺内，11世纪初增建了具有伊斯兰特色的大圆顶，1099年十字军将该寺部分改为教堂，其他当做神庙及骑士团的营房和武器库，1187年埃及阿尤布王朝素丹萨拉丁下令重建，1948年以色列当局拆毁阿克萨周围大部分建筑，1969年8月21日又放火烧毁了寺的主要建筑物，至今仍未放弃相关的“考古”发掘。倭马亚清真寺最早是罗马帝国的朱庇特神殿，后改为圣约翰大教堂，705年倭玛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接收了这座教堂，历时十年将之改建成清真寺，但保存了教堂布局、望楼等，至今仍存有施洗约翰和萨拉丁的陵墓。科尔多瓦清真寺是786年由倭玛亚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下令在罗马神庙和西哥特式教堂的遗址上修建，后经多次扩建，但阿拉伯建筑风格并没有大的改变。13世纪天主教徒占领科尔多瓦后将清真寺变为教堂，15世纪开始改建工程，耗时240年，混合了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等不同建筑式样。16世纪初阿隆索·曼里克主教代表卡洛斯五世国王全权主持清真寺改建工程，建起了一座文艺复兴式大教堂。18世纪时宣礼楼又被基督徒用一座巴洛克式的塔楼替代。可见，阿克萨清真寺、倭玛亚清真寺与科尔多瓦清真寺都曾在历史上经历了“寺堂改建”，也因此成为伊斯兰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并存的特殊建筑物，供不同宗教的信徒前来朝拜；与之相对的则是发生在天主教传统国家意大利的“寺堂共用”：伊斯兰尚未成为意大利法律承认的合法宗教，但其穆斯林人口已超过120万，只在罗马有一座大清真寺，其他地方建寺都遇到阻扰。两年前，在威尼斯城波恩兹诺镇的穆斯林社会领袖走进圣母升天教堂请求神父每周五借用殿堂做穆斯林礼拜使用。东艾尔多·达涅烈神父坚持认为“大家同进一个教堂”就是在进行宗教间对话，并最终促成了“寺堂共用”。但他本人却遭受了巨大社会压力，意大利最大日报（Corriere della Sera）竟发表社论表示：“我们看到圣母升天教堂的事实，让我们感到寒心……把穆斯林转变成基督徒是没有希望了，但愿我们的神父不会在某一天宣布改信伊斯兰。”作为欧洲基督教中心的意大利，达涅烈神父主持的圣母升天教堂发生的变化反映了整个欧洲在演变。孔汉思曾强调：“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便没有各文明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间的对话，便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清真寺是禁止异教徒和武力纷争的“穆斯林之家”，但应该与“他者”进行对话，充分发掘宗教礼拜场所先有的宽容慈怀、扬善止恶的精神资源优势，在特定宗教空间进行对话，以形成教际对话的长效机制。

(二) 从沙特国王到爱资哈尔的伊玛目，都在积极推动伊斯兰与世界的对话，也因具有世界公共知识分子品质而成为全球化时代所需的宗教领袖

2006年9月，教皇将伊斯兰与暴力相联系的演讲，激化了梵蒂冈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2007年11月，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与教皇进行了历史性会晤，并就“不同文化和信仰间进行对话的重要性”等议题展开讨论；由伊斯兰世界联盟主办的伊斯兰对话国际会议于2008年6月4日在麦加召开，以“如何应对伊斯兰国家面对的共同挑战”为题向世界传达和平友善信号；2008年7月，由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共同发起召开了“世界对话会议”；在沙特国王推动下，2008年11月13日，包括沙特国王在内的近20位国家元首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参加了题为“为了和平促进宗教和文化间对话、理解与合作高级别会议”……爱资哈尔大学每年斋月向世界各国派遣优秀伊玛目奔赴五大洲宣教一个月，多以宣讲《古兰经》基本教义和伊斯兰文明史为主要内容，赢得各

See <http://www.xaislam.com/wen/list.asp?id=3907>.

[德国]孔汉思、库舍尔主编；何光沪译：《全球伦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国普遍好评，被誉为“伊斯兰和爱资哈尔的亲善大使”。但伦敦大爆炸使多数西欧国家震惊，开始把国家安全的注意力转向清真寺和穆斯林社会，对清真寺伊玛目进行严格审查，并通过当地伊斯兰组织商定清真寺伊玛目执行教务的指导原则，将宣传极端思想的伊玛目驱逐出境。近年来，西方各国内政部工作规划中都增加了对穆斯林社会和清真寺管理条例，在伊斯兰知识和处理教务原则上都应参照爱资哈尔大学的国外伊玛目工作精神，世界各国政府都承认爱资哈尔大学是现代世界伊玛目的培训基地。可见，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和爱资哈尔的伊玛目已在不同层面承担起全球化时代宗教领袖的责任与义务，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亦即“宗教领袖必须在他们各自的宗教语言之外，发展一套具有重叠共识的世界公民语言。也就是说，宗教领袖必须同时履行全球性公共知识分子的义务。他们不仅要关切各自‘信仰社群’的福祉，也要为人类的存活和兴旺作出贡献。”从这些宗教领袖自身体现出的对话精神值得倡导。

（三）构建清真寺话语体系，建立伊斯兰文明的权威阐释话语，修复或还原伊斯兰文明本真

“道成经典”的伊斯兰教尤为看重经训解读，伊斯兰文明的阐释主体极具权威性，自穆圣任首位阐释者起，阐释权基本都由清真寺的伊玛目掌控，历史上伊斯兰制度文化唯一的权威解释主体是精通经训、教法、教规的宗教学者阶层。他们上有统治者的庇护，下有民众的敬重，不仅为传播宗教文化作出巨大贡献，而且以其特有方式精心守护着宗教思想的正统性和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大一统封建帝国的解体，文化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已成为主导趋势之一，出现了伊斯兰文明解释主体的愈益多元化，大体包括：（1）近代最早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是“政治伊斯兰”的一种形态，它对伊斯兰文化的诠释，强调“团结意识”和“奋斗精神”（伊斯兰圣战）；（2）后起的现代主义潮流本质上是文化适应主义，它对伊斯兰教的诠释具有：“辩护主义”倾向，认为伊斯兰文化传统中同样富有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科学思想、理性主义精神；（3）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诠释有两大流派，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世俗主义、政教分离、宗教个体化等非宗教思想原则，而阿拉伯民族主义注重政治功利主义，其诠释既肯定宗教的民族性，也不断然否定民族性格中的宗教因素；（4）原教旨主义是当今“政治伊斯兰”的主要形态，其解释倾向于注重伊斯兰文化的主体性，以回归传统、反对西方化、世俗化为本质特征。此外，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广泛复杂性也导致了阐释伊斯兰的随意性。不仅宗教学者、宗教“神职”人员仍以权威解释主体自居，政府官员、军政强人、政党领袖、非宗教专业的师生乃至宗教政治反对派头面人物、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鼓吹者都常以宗教名义表达相异的阐释观。正是由于伊斯兰文明阐释主体的多元和复杂性，也影响了世界对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认知，再加上九一一事件后“伊斯兰恐怖论”蔓延全球，世界穆斯林在“被审”中陷入无言和失语当中。因此，为扭转西方霸权语境中伊斯兰形象被误读的不利局面，归并伊斯兰文明阐释主体、重树权威阐释者、构建清真寺话语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作为伊斯兰文化场域的清真寺，包括伊玛目为首的宗教领袖和阐释权威、穆斯林既是礼拜者，又是经训解读的倾听者与实践者，清真寺既是礼拜场所，又是经注学家的摇篮，由此形成“阐释者（伊玛目）+倾听者（穆斯林）+话语平台（清真寺）”，拥有清真寺这一话语平台的阐释者应秉承伊斯兰“创制”传统，对经训做出合乎时代精神的诠释，杜绝一切背离伊斯兰和平本相的干扰性阐释，进而构建起依托清真寺的阐释机构，维护伊斯兰文明的阐释权威性。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See <http://gb.cri.cn/3821/2005/07/22/1425@631671.htm>.

蔡德麟、景海峰主编：前引书，第20页。

参见吴云贵：《当代伊斯兰文明的趋势与特点》，<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5201813.htm>。

Mosque and the Form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slam Civilization

Ma Lirong

pp. 30 - 36

Mosque has been the symbol of Islam civilization for its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works of the Koran and its important role in creating material, spiritual and systematic culture of Islam. The spreading history of Islam is the history of creating of mosque and the history of muslim immigration, and mosque as cultural symbol and transportation media played the dual role in spreading Islam civiliz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role followed by the processes of nomadic tribe from settlement to coexistence of mosque and market, Islam city, Islam country, Islam culture circle, global Islam community.

The role of mosque in promoting Islam civiliza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enough. It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iritual resource of religion ceremony and to help establish the long term dialogue system among religions. The dialogue spirit of King Abdul of Saudi Arabia and Imam in Azhar should be regarded for their undertaking such responsibilities. The interpreters who own the dialogue platform of mosque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creation" of Islam and interpret the Koran corresponding to the times spirit, so that maintain the power of interpreting Islam civilization.

The Current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ivilization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States

Ma Mingliang

pp. 37 - 41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re both broad and profound, and both have deep and solid foundations of culture and lasting vitality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and great changes and readjustment in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structur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 have been increasingly showing their unique charms. There are some different grounds in the commons and some common grounds in the differences for both civilizations. Cultural pluralism is a healthy, active and construc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adigm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 have surprising similarities and extensive consistency in the basic humanistic spirit and ethical thinking, which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ir dialogues and exchanges. The two kinds of civilizations should and can make a dialogue or learn from each other to overcome one's weaknesses by acquiring others' strong points in the field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orld peace, global ethics and other area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make their due contributions.

On the Feature and Influence of Israeli Nuclear Policy and Strategy

Xia Liping

pp. 47 - 52

Israel formulated its nuclear policy and strategy in three stages. Now its strategy has following characters: improving its nuclear structure of trinity; strengthening func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nd power of nuclear deterrent, taking a nuclear equivocal attitude for avoiding query of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trying to prevent the neighboring Middle East countries to own nuclear capability. This nuclear strategy

has made such influence on this region: Israel's capability of nuclear weapon de facto has brought tension into the Middle East; it has brought negative effect on world non-proliferation system and become an obstacle to establish regional non-proliferation system. Israel's nuclear stand may provoke ambition of Arab states to develop their nuclear capability and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nuclear conflict.